

二十世紀初中韓士人的「排滿」思想

——以章太炎和鄭喬為線索

秦麗*

摘要

二十世紀初，在救亡圖存的時代命題下，明清鼎革後形成的「排滿」記憶與觀念成為章太炎、鄭喬等中韓知識分子共同指向的思想資源。章、鄭不僅以明史書籍為紐帶有所交往，二者「排滿」思想的暗合更在章氏《馗書》初刻本〈帝韓〉篇達到頂峰，該篇強調尊朝鮮、黜清朝，實乃章氏為早年的改良主張所作的最後理論補充，其後章氏轉向革命立場，〈帝韓〉篇亦遭到刪除。事實上，由於兩國具體國情的差異，雙方雖同樣標舉「排滿」，內裡的動機與目的卻完全不同。鄭喬等韓國近代知識分子是以「排滿」思想來排清、排日，尋求國家的獨立自主；以章太炎為代表的清末民初革命黨人則旨在發動「排滿革命」推翻清朝統治，建立以漢族為主，甚至涵攝朝鮮在內的「中華民國」。他們基於不同的歷史境況做出了各自的選擇，這也標示著中、韓在近代以來的不同發展道路。

關鍵詞：中韓「排滿」思想、章太炎、鄭喬

一、前言

近年來，伴隨「東亞」、「亞洲」熱的興起，學者們圍繞朝鮮王朝的尊周思明和「小中華」意識及其在近代的繼承與發展，進行了相當深入細緻

2018年4月20日收稿，2018年12月28日修訂完成，2019年7月11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博士後研究。

地探討，其間亦湧現出不少精湛的學術專著。¹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問題與中國清末民初的「排滿革命」之間有著某種隱秘而值得重視的關聯，² 特別是二者在「排滿」觀念上的一致性，似乎鮮為學界所重視，亦未見將二者結合起來進行綜合考察的先例。³ 與此同時，章太炎和鄭喬不僅分別是

-
- 1 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一書系統梳理了朝鮮王朝尊周思明思想、「小中華意識」的形成淵源及其在史書撰寫、曆法正朔、祠廟祭祀等諸多方面的種種表現；王元周，《小中華意識的嬗變——近代中韓關係的思想史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集中探討了朝鮮「小中華意識」在近代以來的表現與嬗變。相關著作還可參葛兆光，《想像異域——讀李朝鮮漢文燕行文獻札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王鑫磊，《同文書史——從韓國漢文文獻看近世中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等等。又朝鮮高宗於 1897 年稱帝，改國號為大韓帝國，而在本文主要探討的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這一歷史時段，「朝鮮」與「韓國」的說法並行於世。鑒於行文的統一，文章標題採用「韓」字，正文中依據具體語境，也使用「朝鮮」。
 - 2 關於清末民初的「排滿革命」，相關論著可參考王春霞，《「排滿」與民族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美）路康樂（Edward J. M. Rhoads），《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1861-1928）》（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論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相關論文參見劉大年，〈評辛亥革命與反滿問題〉，《劉大年史學論文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頁 310-324；章開沅，〈「排滿」與民族運動〉，《近代史研究》1981.3(1981.8): 72-93；章開沅，〈辛亥革命時期的社會動員——以「排滿」宣傳為實例〉，《社會科學研究》1996.5: 93-99；楊定名，〈論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革命排滿」口號〉，《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2.2: 70-76；（日）石川禎浩，〈20 世紀初年中國留日學生「黃帝」之再造——排滿、肖像、西方起源論〉，《清史研究》2005.4(2005.12): 51-62；瞿駿，〈歧義與多義——清末「排滿」立論與接受的再考察〉，《史林》2015.6(2015.12): 122-134；等等。此外，還有諸多個案研究，如李潤蒼，〈試論章太炎的民族主義〉，《近代史研究》1981.3(1981.8): 256-285；張玉法，〈晚清的民族主義（1895-1911）——以章炳麟為中心的觀察〉，《第二屆中國近代思想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頁 1-21；李帆，〈西方近代民族觀念和「華夷之辨」的交匯——再論劉師培對拉克伯里「中國人種、文明西來說」的接受與闡發〉，《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2(2008.4): 66-72 等。此類著述數量繁多，恕不逐一羅列。
 - 3 王元周，《小中華意識的嬗變——近代中韓關係的思想史研究》和楊天石，〈中韓愛國志士的早期聯繫〉（《史學月刊》2007.3: 51-58）文中曾零星提到過李承熙、申圭植等

當時中韓排滿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且二者之間還存在相似的社會活動經歷和交遊往來，鑒於此，本文擬以章太炎和鄭喬為線索，對二十世紀初中韓兩國知識分子的「排滿」思想展開初步討論，並藉以管窺「排滿」思想在兩國，特別是韓國近代思想史中的意義。

二、由幾本韓國明史書籍說起：「排滿」之時代背景

劉聲木《菴楚齋隨筆》載：「自光緒末造，種族革命之說興。一人倡之，千百人和之，遂至釀成宣統辛亥之變，而清社易屋。論者遂謂種族之見創自泰西，流被東瀛，四十年內，其說盛行於時。不知此種心理，其淵源早發見於三四百年以前，是當時之人，早已有此心理。其與近世相應者，蓋亦有故。我朝入關之後，禁忌各書，檢查毀滅尤甚嚴，難保無流入東瀛者。東瀛得以因之鼓蕩中國人心，助成其事。」⁴其中提到清代末期，關涉明末清初歷史的「禁忌各書」自東鄰日本回流入中國，革命黨人借之鼓動人心，宣導反滿。回溯歷史，徵諸革命黨人本身，排滿鬥士章太炎即曾言：「惟明代之史，則以有清一代之刪改，已多脫漏。日本與中國毗鄰，歷史之真本之不能存留於中國而流入日本者甚多，倘日本能以此種材料供給中國人，極所歡迎」。⁵這段文字出自章氏 1924 年致日人朝岡繼之信，此時他正致力於明末清初歷史的研究，言語間流露出欲求相關書籍於日本之期望。由劉、章二氏之論可以發現，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知識界對「禁忌各書」由日本發源似有較為一致的認識與關注。不過，王汎森在《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中指出，當時仍有不少「殘明文獻」是道、咸以來逐漸復出的本土收藏物，⁶此論誠然不錯，但劉、章所指向的海外求書作為「排

朝鮮士人對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政權的支持態度，但均未針對二者「排滿」觀念的契合展開細緻分析。

4 清·劉聲木，《菴楚齋隨筆續筆、三筆、四筆、五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349-350。

5 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頁 820。

6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頁 631。

滿革命」及其餘波的重要國際因素，仍值得我們予以特別關注。

實際上，在日本之外，當時還有從韓國流入的「舶來文獻」。章太炎即曾參與其事。章太炎（1868-1936）作為中國近代的重要革命家與學問家，自謂少時讀蔣良騏《東華錄》即萌仇滿之念，視清朝亡明為夷夏失防之大禍，因之十分留心明季史料，熱衷表彰明遺民，甚至提出撰寫《後明史》的構想。⁷ 由此，搜集明史相關資料便成為章氏的一項重要工作。1906年6月末，章氏在「蘇報案」期滿釋放後，由中國同盟會護送東渡日本，之後一邊從事革命活動，一邊進行講學等教授活動。據當時聽課弟子朱希祖在1934年2月8日為《南明綱目》一書之跋文中回憶：「朝鮮人鄭喬所撰南明綱目五卷。余於二十七年前留學日本時已在吾師章太炎先生處見之，時初出版，著者所寄贈也。」⁸ 「南明綱目」即《南明綱目》，故知章太炎曾於1908年旅日期間收到鄭喬所著《南明綱目》初刊本一部。鄭喬（1856-1925）⁹ 字友向，號秋人。作為處於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交替時期的知識分子，鄭氏接受了朝鮮傳統的儒學和朱子學教育，又受到東漸而來的西學之薰陶與影響，是一位頗具革新意識的儒學者和愛國啓蒙運動家，生平撰有《南明綱目》、《大東歷史》、《大韓季年史》等著述。鄭氏曾於1894年（朝鮮高宗31年）擔任宮內府主事、水原判官、長淵郡守等職，但不久即辭官。1896年，他參加由徐載弼等創立的獨立協會，

7 尤學工、余康，〈論章太炎的明史研究〉，《史學史研究》2016.4(2016.12): 53-65。

8 朝鮮·鄭喬，〈南明綱目〉，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編，《域外所見中國古史研究資料彙編·朝鮮漢籍篇》史編史傳類第17冊（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3），朱希祖跋見該書卷末頁590。但該跋文不見於朱希祖，《明季史料題跋（外二種）》（北京：中華書局，2012）。

9 韓國學界關於鄭喬的研究，可參考（韓）金恩珠，〈鄭喬의 政治活動과 政治改革論〉，《韓國思想史學》11(1998): 291-349；김우철，〈鄭喬의 중국사이해와 현실인식〉，《史叢》70(2010.3): 29-58；배항섭，〈鄭喬의 관직경력과 사회활동〉，《韓國史研究》165(2014.6): 185-224；（韓）정립비，〈한말箕子조선 인식에 대한 재고찰——『대동력사(大東歷史)』에 나타난 기자조선 역사서술을 중심으로〉，《사람》65(2018.7): 207-240；等等。此外亦有史學史專著中涉及者，如（韓）申滢植編，《韓國史學史》（首爾：三英社，1999），頁287-297，第二部分第二章《〈大韓季年史〉》；（韓）朴仁鎬著，全瑩、金錦子、鄭經日譯，《韓國史學史》（香港：香港亞洲出版社，2012），頁102。

擔任書記、提議、司法委員等職，積極投身獨立運動，抨擊時政弊病。1898年12月，鄭氏組織參加萬民共同會後被捕入獄，經釋放後避難於美國傳教士創辦的培材學堂，直至1904年1月，才重新參與政治、社會活動。1905年10月，他在內部大臣李址鎔的推薦下被任命為濟州郡守，而實際未到任，1906年1月擔任學部參書官，同年12月任穀山郡守，赴任百餘日後即辭歸。根據鄭氏《南明綱目》自序之落款時間「歲在柔兆敦牂之臨月既望」，¹⁰即陰曆丙午年十二月十六日，陽曆1907年1月29日，可知《南明綱目》大致成書於穀山任職期間。其後該書初刊於1908年漢城普文社，而據前引朱希祖所言「二十七年前」則為1907年，與該書出版時間存在出入，此或朱氏追憶之。¹¹具體而言，《南明綱目》乃是綱目體南明史書，全書凡五卷，記事起崇禎十七年（1644）五月，終永曆十六年（1662），書中特重華夷之辨，大書南明弘光、隆武、永曆年號，以南明為正統，黜清朝為僭偽，鄭喬亦自言「書滿洲，即朱紫陽不書契丹，改其國號遼之義也」，¹²表現出強烈的尊明貶清色彩。眾所周知，朝鮮高宗早在1897年業已稱帝改元，建立「大韓帝國」，而鄭氏於1907年仍著書崇明貶清，這固然受到現實環境的影響，但從中仍可見其對大明王朝之眷戀與追懷。然而，鄭、章贈書這一細節長久為人所忽視，事實上，透過該細節可以發現，他們二人對明史、特別是對明末清初歷史及排滿反清的共同關注，無疑是促成彼此交往的重要因素。

無獨有偶，革命黨人的另一重要成員張繼也與韓國儒學士人產生了聯繫。張繼（1882-1947），字溥泉，早年曾留學日本，與章太炎、鄒容等

10 朝鮮·鄭喬，《南明綱目》序，頁165。

11 據普文社刊本該書卷末所附張志暎跋落款「歲在戊申小春之望海左張志暎端拜謹跋」，知其刊行于「戊申」1908年。又湯志鈞在《章太炎年譜長編（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3）中考證，章氏旅日講學事在1908年，且言朱希祖在《本師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蹟筆記》中亦曾將「戊申」誤作「丁未」。見該書上冊，頁167-168。以上張志暎跋文之「戊申」或可作湯氏之旁證。此外，除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之著錄及金恩珠論文外，韓國奎章閣藏書閣及朴仁鎬撰，《韓國史學史》等諸多韓國論著均將《南明綱目》刊行時間書誤作1907年。

12 朝鮮·鄭喬，《大韓季年史》下冊（首爾：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57），卷8，「隆熙元年（1907）丁未八月十六日」條，頁294。

過從甚密，後來加入中國同盟會，積極宣傳革命，鼓動反清，中華民國成立後歷任要職，晚年曾參與並主導國史館的籌備與創建工作。據蔣逸雪和李光濤的相關記述，張繼早年留學日本期間，途經朝鮮，結識了朝鮮士人俞鎮泰，其後他於 20 年代末向俞氏致信搜求「關係明清大事」之書籍，對方贈以《宣廟中興志》和《皇明陪臣傳》。¹³ 前者約撰於朝鮮王朝英祖時期（1724-1776 年在位），乃記十六世紀末壬辰戰爭的編年體史書，後者是英祖、正祖（1776-1800 年在位）時期重臣黃景源（1709-1787）所撰，記述「丙子胡亂」¹⁴ 期間朝鮮抗清死難諸臣事蹟，因當時朝鮮為明朝屬國，故稱「陪臣」。兩書所記載的明朝對朝鮮的「再造藩邦」之恩以及朝鮮之被迫降清，均可謂關係明清歷史之大關節，且都帶有濃重的尊明反清色彩。然而，張繼作為革命家和政治家，並非專門研究歷史的學問家，此時亦尚未參與國史館事務，他關注明清歷史，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於受晚清「排滿革命」之刺激與洗禮，導致當時社會出現了一股搜讀明季文獻的風潮，¹⁵ 加之張繼本人華夷觀濃厚而排滿之念甚重，由此更加積極搜求明清史事相關書籍，至於清朝滅亡民國成立後仍不已。¹⁶

13 參見蔣逸雪，〈校注朝鮮《宣廟中興志》後記——三百年前中韓合兵敗倭之光榮史〉，《新中華》復刊 2.1(1944): 135-143；李光濤，〈記朝鮮《宣廟中興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2(1950.7): 297-302；李光濤，〈明季朝鮮「倭禍」與「中原奸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6(1955.6): 315-334。

14 後金崇德元年（明崇禎九年，朝鮮仁祖十四年，1636）十二月，皇太極率領滿洲軍隊發動對朝鮮的第二次戰爭，次年正月朝鮮兵敗投降，因朝鮮視清為夷狄、胡虜，故其史書稱此次戰爭為「丙子胡亂」。

15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頁 638-639。

16 易勁鴻，「張繼與辛亥革命」（湖南：湖南師範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頁 6，對張繼反滿意識的形成有較詳細的論述，如滄州張氏家族在清初罹難之烈、受明末孫承宗抗清事蹟之影響等。此外，張氏在 1940 年代主持國史館期間，所擬整理中國歷史的幾條原則，其言：「一，本諸春秋大義，內中華，而外夷狄。二，本諸顧亭林、章太炎史學精神，宋明之亡，直書為中國亡。三，北魏北周遼金元清之史，列於正史之外，只可於事實上認為閩史，明江南鄧元錫著《函史》，不列遼金元，是謂良史。……六，本《春秋》，夷狄進於中國者則中國之，中國而進於夷狄者，則夷狄之。（如朝鮮、安南乃以夷狄而進於中國者，劉豫、張邦昌、汪兆銘則以中國而進於夷狄矣。」可知其華夷觀之濃厚，見張繼，《張溥泉先生回憶錄·日記》（《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 3 輯第 24 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85），「民國 30 年 12 月

可以看出，與前述被復活的「殘明文獻」不同，《南明綱目》、《宣廟中興志》和《皇明陪臣傳》這些來自異域的史書並非由明末清初的中國人撰寫，而是由朝鮮王朝士人寫就，且多撰成於明亡之後的清朝時期，然而，它們與「殘明文獻」一樣帶有濃厚的反滿色彩。此種「排滿」論調使二十世紀初的中韓知識分子實現了精神共鳴。事實上，除鄭喬、俞鎮泰外，當時許多朝鮮知識分子與中國革命黨人在排滿問題上多有契合。例如，韓國愛國志士申圭植流亡中國後加入中國同盟會，並勉勵黃興徹底推翻清朝統治，¹⁷ 儒學者李承熙聽到清王朝被推翻後為之振奮。¹⁸ 故而，章太炎與鄭喬、張繼與俞鎮泰等的交往並非偶然現象，而是當時中國革命黨人與朝鮮士人相互交往的典型事例。

從更宏觀的角度說，二十世紀初正值清末民初時事動盪之際，面對國勢岌岌的局面，中國國內知識界為實現救亡圖存而進行了維新變法、「排滿」革命等諸多探索與實踐。而此時的大韓帝國亦處於內部社會矛盾激化，外部列強欺凌、日本侵吞的危局之中。因此，韓國國內的有識之士一方面積極針砭朝廷弊政，另一方面通過開展愛國啓蒙運動、培養實力運動，力圖擺脫列強侵奪，恢復國權，實現韓民族的獨立自主。¹⁹ 相似的家國境遇和共同的救國訴求，使得彼時中韓兩國知識分子多有來往，特別是章太炎、張繼等中國革命黨人與韓國儒學者同樣具有華夷之辨、尊明貶清的思想基礎，且倡言亞洲互助抵抗西方侵略，因此他們與朝鮮士人的往來就成為時代造就之產物。特別是 1907 年，章太炎、張繼在日本組織亞洲和親會，廣泛聯合印度、朝鮮等國愛國志士，共同反抗帝國主義，筆者推測，章氏或在此時直接或間接結識了朝鮮人鄭喬。²⁰

10 日」條，頁 146。

17 楊天石，〈中韓愛國志士的早期聯繫〉，頁 52。

18 王元周，《小中華意識的嬗變——近代中韓關係的思想史研究》，頁 200。

19 參見（韓）李潤和，《中韓近代史學比較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頁 68-81，第四章第一節〈危機意識與民族的自覺〉。

20 參見朱務本，〈亞洲和親會的作用、局限及其他〉，《華中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1989.3: 55-60。關於參加亞洲和親會的朝鮮代表，由於史無明文，鄭喬是否親自參與不得而知。又楊天石，〈中韓愛國志士的早期聯繫〉一文根據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增訂本）》，卷 3，光緒三十三年丁未（1907）三月條，指出朝鮮代表有當時在日留學的

由此，在救亡圖存的時代背景下，傳統的華夷之辨、排清尊明成為章太炎、鄭喬等中韓知識分子共同指向的思想資源，但因為彼此國情不同，當時中韓士人的「排滿」思想仍存差異，探討二者的異同對於我們深入研究兩國的不同發展道路頗有裨益。

三、「排滿」之共性：〈帝韓〉篇在《嘯書》中的存廢及其思想意涵

明清鼎革之後，由於清朝以異族入主中原，受傳統儒家華夷觀的影響，無論在清朝還是朝鮮王朝，皆存在或明或暗的反清排滿浪潮。清朝定鼎之初，南明政權的奮起抵抗，三藩之亂的爆發及曾靜、呂留良案等文字獄的接連出現，都是國內反滿情緒的重要表現。隨著康雍乾時期清朝統治的日益鞏固及其文化高壓政策，清朝內部的反清浪潮與活動逐漸轉為暗流，直至道、咸以後，官方文網管控漸弛，而國勢日益衰微，「記憶與挫折的經驗相加，才能將歷史的記憶轉譯成現實的華夷種族意識」，²¹ 加之西方近代民族主義的刺激，最終演變為清末革命黨人聲勢浩大的排滿運動。在此背景下，章太炎、黃節、鄧實等革命黨人和南社成員，除積極尋訪和刊刻涉及明清鼎革的相關史書外，還通過對元明革命、太平天國運動的「民族主義想像」，²² 對清初明遺民的塑造，如宣揚全祖望素負民族氣節說等多種方式，²³ 力圖激揚民族主義，鼓動反滿情緒。

趙素昂，但查湯氏《年譜》並無趙氏參與之記錄，且韓國學者趙萬濟、孫科志所撰〈趙素昂先生略傳〉（浙江大學韓國研究所編，《韓國研究》第 4 輯，杭州：浙江大學韓國研究所，2000）亦無相關記錄，楊文疑誤。

21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頁 17。

22 劉浦江，〈元明革命的民族主義想像〉，《中國史研究》2014.3(2014.9): 79-100；劉浦江，〈太平天國史觀的歷史語境解構——兼論國民黨與洪楊、曾胡之間的複雜糾葛〉，《近代史研究》2014.2(2014.4): 84-99。文章指出，無論是元明革命還是太平天國運動，都沒有太多的民族革命內涵，清末民初排滿的時代氛圍，使二者呈現出濃厚的民族革命色彩。

23 參見楊啟樵，〈論全謝山史學的精髓〉，《清史研究》1994.2(1994.6): 105-108。文中寫道：「清末，為了革命，淬厲民族思想，《鮚埼亭集》曾經被用作宣傳工具，強調他

章太炎作為清末「排滿革命」中最突出的反滿鬥士之一，在《民報》、《國粹學報》等刊物上發表了諸如《討滿洲檄》、《排滿平議》、《正仇滿論》等大量排滿言論，倡導「俾我四百兆昆弟同心戮力，以底虜酋愛新覺羅氏之命，掃除腥羶，建立民國，家給人壽，四裔來享」等反滿主張，²⁴ 對此，前輩學者討論已多，茲不贅。然而吊詭的是，即使在民國肇基以後，章氏仍不時流露出「排滿」之情緒。此處僅舉一例以窺其豹。1927年，章太炎撰寫了一篇題為《張督師祠記》的短文，文中提到「余杭倉前有張老相公祠，傳為潮神，云以夏正三月六日生……顧不知張老相公何神也」，其後又言「民國十五年春，過南屏山，謁明督師兵部尙書滄水張公墓。問督師支族嘗有來墓祭者乎？答言歲歲有之，其謁墓常以三月六日」。於是，章氏依據傳說中「張老相公」的生日與明末抗清將領張煌言（號蒼水）的祭拜日期均為三月初六，從而判定「張老相公」即張煌言，並指出這是明遺民迫於清朝的政治淫威所用之託名。²⁵ 章氏的這一說法恐怕並不可靠。據今人朱海濱研究，有關「張老相公」的傳說與崇祀，早在北宋時就已存在，其風俗歷經元、明、清三代而不衰，且朱氏通過對由宋至清相關史料的詳細梳理，考訂出「張老相公」乃宋仁宗年間（1022-1063年在位）兩浙路轉運使張夏，因其治理錢塘江潮患有功，被當地百姓所推崇並建祠紀念，這一故事最終演化為「張老相公」潮神信仰。²⁶ 因此，章太炎將「張老相公」定為張煌言顯然是錯誤的。這當中雖有考證技術上的問題，但章氏潛意識裡對「蒼水先生」的欽佩與仰慕，無疑是造成他錯誤聯想與判斷

『褒獎氣節』，此乃時代使然，力辯全祖望只是表彰忠義，並無反清意圖；另可參陳永明，《清代前期的政治認同與歷史書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263-276，附錄〈全祖望「素負民族氣節」說平議〉。

24 民意，〈紀十二月二日本報紀元節慶祝大會事及演說辭〉，《民報》10(1906.12)，頁82。

25 朱維錚編校，《章太炎全集》第5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頁340-341。包括章氏對「張老相公」的誤判在內，結合「排滿革命」中對元明革命、太平天國運動的民族主義想象，對全祖望民族氣節的認定等，可以發現，清末民初革命黨人在進行「排滿」宣傳時，對歷史事實的判斷產生了或多或少的歪曲或誤解，也對相關研究工作的展開造成了一些干擾。因此，今人在看待當時「排滿」人士有關歷史問題的敘述時務須謹慎小心。

26 朱海濱，〈錢塘江潮災與張老相公信仰〉，《海寧史志》2012.3(2012.9): 19-33。

的重要因素。誠如陳永明所論，張煌言的抗清事業與「英雄事蹟——特別是被執後堅持『臨難毋苟免』的勇氣——卻在其身後經由他的遺集和遺民友人的筆錄而得以代代相傳，成為後世對明、清鼎革時期的重要歷史記憶」。²⁷ 於是在清末的「排滿」浪潮中，革命黨人積極運用此種歷史資源，乘勢刻印《張蒼水集》，黃節撰成《張煌言傳》，借其反清壯舉宣揚反滿。對生處同鄉的章太炎來說，有關蒼水先生的生平事蹟更是耳濡目染，感受深切，從而對張煌言推崇備至，最終效仿張氏走向「排滿革命」之路。章太炎弟子錢玄同為其所作輓聯云：「續蒼水、寧人、太沖、姜齋之遺緒而革命，蠻夷戎狄，矢志攘除」，²⁸ 可謂深得乃師排滿之鬥志與決心。

值得注意的是，章氏的《張督師祠記》和前述張繼東國求書之事，皆為民國成立後之言行，但由章氏對「蒼水先生」的執著景仰，張繼對南明史事之孜孜搜求，不難想見清末革命運動中排滿情緒之強烈。因此，雖說「五族共和」下的中華民國已無「排滿」之法理依據，但「排滿」作為一種「不合時宜」的文化背景與歷史認識，儼然已滲透至革命黨人的思想深處，並未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而稍減。

與章太炎同時代的朝鮮人鄭喬，儘管生活地域不同，卻同樣帶有濃重的排清意識。十九世紀中後期，清政府加強了對於朝鮮的控制，鄭喬在《大韓季年史》中曾專門載錄此一現象：「是時清將袁世凱、吳兆有、張光前等，駐屯於京城內，其兵為數百人，施其威勢……預我內政為甚」，²⁹ 言語間流露出其對清朝之排斥與嫌惡態度。鄭氏的排清意識在所撰《南明綱目》中有更直接的體現。他在該書自序中寫道：「愛新覺羅氏以女真之遺種，竊據支那之全幅，冠履倒置，腥羶彌滿殆三百年」，從種族視角出發，將清人視作夷狄，對其竊據華夏給予了無情抨擊；另一方面則高度讚揚了南明抗清人士：「若朗讀史道鄰、高英吾之書疏，黃道周、張國維之詩詞，

27 陳永明，〈政治抑壓下的集體記憶——清初張煌言事蹟的傳播〉，《漢學研究》34.2(2016.6): 107-140。

28 錢玄同，〈太炎先生輓聯〉，《制言》22(1936.8)，頁4。

29 朝鮮·鄭喬，《大韓季年史》，卷1，「高宗二十一年甲申春正月」條，頁25。

忠憤痛哭之聲，發於楮墨之表，凜凜義烈，千載猶生」。³⁰ 此外，書中凡例云：「大書南明揭南都之中興也，繼書聖安皇帝弘光元年，尊正統也，分注清世祖愛新覺羅福臨順治二年，黜僭偽也。」³¹ 明確將南明政權視為正統，而黜清朝為僭偽。鄭氏在本書中還寫道：「福臨以滿洲之丑虜，侵犯中國，塗炭生靈，戕害共主，僭稱大號，罪浮于晉之劉聰、宋之完顏，故稱主書卒，所以扶三綱立人極、扶陽抑陰之大義也。」³² 鄭氏的這種強烈的排清意識實則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可追溯至朝鮮王朝歷史上的尊周思明思想。朝鮮王朝自建立初期，即與明朝保持著相對穩定的宗藩關係和頻繁的政治經濟往來，特別是朝鮮王朝後期壬辰戰爭（1592）爆發，萬曆皇帝出師援助才使八道江山免於覆亡之禍，由此，朝鮮王朝對明王朝字小之恩十分感激。明朝滅亡後，基於傳統的華夷觀和對明朝「再造藩邦」的感恩，以及清軍兩度兵臨城下的屈辱記憶，朝鮮王朝呈現出強烈的尊明貶清情緒，表面上維持與清朝的宗藩關係，實則在文化心態上一直視清為夷狄，同時為感佩明朝恩德，在明亡後長期堅持尊周思明理念，朝鮮孝宗（1649-1659年在位）與大臣宋時烈（1607-1689）乃至以「尊王攘夷」為旗號，大倡「北伐論」，欲為明朝復仇。伴隨尊周思明而產生了視朝鮮為明朝繼承者的「小中華」意識。朝鮮「小中華」思想尤其強調種族因素，只認同漢族政權具有中華正統，非漢族的王朝皆被斥為夷狄，他們認為在中華世界體系中，唯有朝鮮實現了由「夷」到「華」的轉變。因此，明朝滅亡後，清朝被朝鮮人視作夷狄，朝鮮自身則成為中華之餘脈。³³ 這種「小中華」意識在朝鮮英祖、正祖時期日益強化，並延續至朝鮮王朝末期。在尊周思明的時代氛圍下，朝鮮王朝湧現出眾多官私明史

30 朝鮮·鄭喬，〈序〉，《南明綱目》，頁 160、163。

31 朝鮮·鄭喬，《南明綱目》，卷 2，頁 281。

32 同上註，卷 5，頁 569。

33 詳參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頁 418-423。韓文論著可參考（韓）許太榕，〈17세기 말~18세기 초 中華繼承意識의 형성과 正統論의 강화〉，《진단학보》103(2007.6): 59-85；（韓）許太榕，〈英·正朝代 中華繼承意識의 강화와 宋·明 역사서의 편찬〉，《朝鮮時代史學報》42(2007.9): 237-269。

書籍，如正祖御撰《明紀提挈》、李玄錫《明史綱目》、南有容《明書纂要正綱》、黃景源《南明書》等，這些史書無不奉南明正朔，否定清朝的正統地位，其中以趙徹永所撰《續明史》反清最為激烈，全書「凡系清字悉改以奴」，言語近乎謾罵，攻擊清朝不遺餘力。³⁴ 處於朝鮮王朝末期的鄭喬繼承了傳統的尊明貶清意識，在《南明綱目》中重申此義，故與極力宣揚「排滿」的章太炎等清末革命黨人在思想上形成了交集。

更為重要的是，章、鄭二人在「排滿」問題上的契合，在章太炎首部自選集《煊書》初刻本的〈帝韓〉篇中達到了頂峰。清朝自入主中原後，礙於明清之際正統歸屬之糾葛，從未承認南明隆武、永曆政權的合法地位，無論在清代官修《明史》、《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抑或《御批歷代通鑑輯覽》中，均未大書永曆年號，³⁵ 而章氏在〈帝韓〉篇特別標舉永曆紀年，逕書「自永曆喪亡以至庚子，二百三十有九年」，³⁶ 足見其追念明朝、感慨「中夏亡國」之意。又，永曆皇帝（1646-1662 年在位）在 1662 年被投降清軍的吳三桂殺害身亡，其後 239 年乃庚子 1900 年，故知〈帝韓〉篇作於是年。³⁷ 那麼，章太炎為何要「帝韓」呢，茲引其原文如次：

34 朝鮮·趙徹永，《續明史》凡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編，《域外所見中國古史研究資料彙編·朝鮮漢籍篇》史編史傳類第 14 冊，頁 10。

35 參見何冠彪，〈清高宗對南明歷史地位的處理〉，《新史學》7.1(1996.3): 1-27；何冠彪，〈清高宗《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的編纂與重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0.3(1999.9): 671-697；秦麗，〈《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考論〉，《史學史研究》2015.4(2015.12): 109-118。

36 朱維錚編校，《章太炎全集》第 3 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頁 77。

37 此處對〈帝韓〉篇的具體完成日期稍加說明。章太炎《煊書》初刻本目錄後序落款時間為「辛丑後二百三十八年十二月」，據朱維錚在《章太炎全集》第 3 卷前言中考證，此年應為己亥 1899 年，同時指出〈帝韓〉篇作為《煊書》初刻本中最晚完成的一篇，實際上其完稿時間已入庚子年，即 1900 年 1 月 31 日之後，並認為《煊書》初版印行不會遲於 1900 年 4 月上旬。按此推算，則〈帝韓〉篇的完成日期大致在 1900 年 2 月至 4 月間。不過，筆者發現了一則材料可將時間範圍進一步縮小。章太炎在 1900 年 2 月 23 日寄呈弟子錢玄同的信中說：「文集約七八萬言，移疏易了。《煊書》亦都計十萬言。唯《左傳讀》稿未編定。要之排比亦易。」（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頁 103，言下之意，《煊書》初刻本的內容在 2 月 23 日前業已完成編定工作，則〈帝韓〉篇完成時間應在 2 月 1 日至 23 日之間。

或曰：以左衽之未削，息壤之宰割於戎虜，而推孔氏以為素王，則嫌於窮大；無陪無卿，而黎民無所寄。今其言常主，使柱下徵藏，秉元以正春王，量其名實，則誰氏寔奉？曰是亦朝鮮也。今夫同陝同族而分其廟社者，烝嘗雖異，其相視以為冠帶之國，均也。……今視朝鮮，若七雄三國十鎮之相視，夫孰能異議？且吾營域攘奪於滿洲，壁琮圭璋琥璜之木，不挾四方，而朝鮮猶戴其故主。則其視之非特爾也，乃若中原之民，當苻石、元魏、女真而視江左也。為下民綴遊，上統元皇以屍嶽瀆者，將在是乎？其抑者在腥羶穢德之滿洲乎？³⁸

章氏此處立論的背景正是明朝滅亡之後中華正統的歸屬問題，即中華正統是歸諸清朝，抑或其他？在本段中，他先以「或曰」的方式拋出問題：有人說，由於華夏大地為夷狄所攘奪而尊孔子作素王似有不妥，因為孔子無陪臣無卿士，百姓無所寄託。章氏接受這一質疑，退而訴諸「常主」即握有實權的君主。次句中「柱下徵藏」代指史官，「秉元以正春王」語出《春秋》「王正月」，乃昭示正統之語，即如若讓史官來確定名副其實的華夏共主，則應奉朝鮮為正統，其原因在於，朝鮮雖處異域，卻與華夏同族，均以儒家文化為指導思想。由此，章太炎明確肯定了朝鮮作為中華繼承者的正統地位，與之相應則否定了清朝或滿洲的合法性，並將滿洲與朝鮮比擬為前秦、元魏之與東晉爭正統，從而將朝鮮納入到中華正統的歷史譜系中。隨後，章氏高度表彰了朝鮮在明亡後仍尊奉崇禎紀元，及「至今朝鮮有大報壇，祭祀明三後」等舉動，進而再次強調「自永曆喪亡以至庚子，二百三十有九年，諸夏之常主，自非朝鮮，抑孰有具位者乎？」³⁹顯然，章氏在尊奉明朝的邏輯前提下，主張明亡後應以朝鮮為正統，此篇以「帝韓」命名，即為表彰朝鮮之正統性，包括 1897 年朝鮮高宗稱帝改元，建立大韓帝國，章氏亦持肯定意見，認為「韓建光武，固已崇矣」。⁴⁰至此，

38 朱維錚編校，《章太炎全集》第 3 冊，頁 77-78。

39 同上註，頁 78。

40 同上註。王元周在〈認識他者與反觀自我：近代中國人的韓國認識〉（《近代史研究》2007.2: 61-79）一文中指出，1897 年朝鮮高宗稱帝，清朝總理衙門並未予以直接承認，而仍欲存屬國之體，時任清政府駐朝鮮商務委員唐紹儀更認為這是朝鮮妄自尊大的體現。這些針對高宗稱帝的看法，無不與章氏「帝韓」之論形成鮮明對比。見該文頁 72。

我們發現，章太炎的「帝韓」之論與鄭喬等朝鮮人所秉持的「小中華」思想存在驚人的相似，甚至可以說在論證思路上都如出一轍，亦即，雙方均主張尊明貶清，視滿洲為夷狄，尤其強調滿洲作為異族的種族因素，而以朝鮮為明朝繼承者，前者主張「帝韓」，後者自稱「小中華」，表述雖異，其尊朝鮮、黜滿洲之意則一也。

事實上，章太炎之師俞樾曾針對朝鮮人文集中以崇禎年號紀年有過一段評論，其曰：「夫我朝龍興之始，朝鮮沿襲亡明年號，或尚可附于《洪範》十有三祀之義，至乾隆中葉，彼國久列藩封，世膺封號，乃尚以崇禎紀年，不亦僭乎？」⁴¹ 可以看出，俞樾反對朝鮮在清朝鼎盛之際仍奉明朝年號的做法，而對朝鮮不滿的背後折射出的是他對清代統治的政治認同。⁴² 與弟子章太炎把清朝當作「腥羶穢德」之異族不同，俞樾乃視清朝為理所當然的「我朝」，由此出發，他自然不能同意作為清朝藩國子民的朝鮮人私自使用明朝紀年。所以，俞、章二人對清朝截然不同的政治態度，已為日後師徒關係的破裂埋下了伏筆。

值得注意的是，〈帝韓〉篇僅見於《嘯書》初刻本，到 1902 年《嘯書》修訂本手稿目錄及 1904 年《嘯書》修訂本正式刊出後，〈帝韓〉篇即消失不見。其原因在於章太炎的政治立場及對所謂「震旦之共主」的認識發生了變化。現有研究表明，戊戌變法前後，章氏受康有為、梁啟超今文經學之影響，在思想上呈現尊孔的傾向，在政治上與清廷妥協，主張在清朝的政治框架內實行變法維新。⁴³ 刊刻於 1900 年初的《嘯書》初刻本的整體旨趣，特別是《客帝》篇的主旨正是以孔子及其後裔（衍聖公）為「共主」，降清帝為「客帝」，實現在不排滿的條件下尋求政治出路。⁴⁴ 《嘯書》初刻本《客帝》篇曰：「昔者《春秋》以元統天，而以春王為文王。文王孰

41 清·俞樾，《春在堂隨筆》（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卷 9，「玉吾集」條，頁 120。

42 關於此問題，可參考楊念群，〈章學誠的「經世觀」與清初大一統意識形態的建構〉，《社會學研究》2008.5(2008.10): 1-41；劉浦江，《正統與華夷——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7）。

43 湯志鈞，〈章太炎在臺灣〉，《社會科學戰線》1982.4(1982.12): 142-151。

44 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論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頁 72。

謂？則王愆期以為仲尼是已。」⁴⁵ 毋庸置疑，此處乃是以孔子為華夏共主。不過，前引〈帝韓〉篇中的「或曰」表明，針對孔子作為「素王」毫無實權之問題，章氏在尊孔的前提下進一步思考了中華正統訴諸「常主」、實際政權之所在，其思想結晶即「帝韓」，以朝鮮而非滿洲為「諸夏之常主」。換言之，章太炎在以孔子為共主、清帝為客帝的基礎上，補充了以朝鮮為常主，使三者形成「共主、客帝、常主」的理論體系，一方面在觀念上尊孔子、朝鮮為正統，另一方面承認清朝的實際統治，從而為改良主義張本，也調和了章氏在政治改良與華夷秩序之間的矛盾與焦慮。可以說，〈帝韓〉作為《煇書》初刻本中最晚完成的一篇，雖已呈現出鮮明的排滿色彩，卻仍未徹底走向革命，反而是為政治改良論所作的理論補充和最後努力。總體而言，章太炎此時仍「與尊清者遊」，政治思想尚徘徊於改良與革命之間。待到 1900 年 5 月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辛丑合約》，唐才常組織自立軍號召「勤王」之後，章氏對時局徹底失望，正式「剪辮斷髮」，走向排滿革命之路。在這種情況下，以改良為旨歸的「客帝」、「帝韓」自然變得不合時宜，其在《煇書》重訂本中被刪改、修訂亦屬題中應有之義。事實上，除刪改原來支持改良的篇目外，章氏在重訂本中還進行了系統的理論重建工作。劉巍《從援今文義說古文經到鑄古文經學為史學》一文注意到章太炎從《煇書》初刻本尊孔子為天下共主到重訂本以周文王為正統的轉變。⁴⁶ 劉氏的觀察非常準確，但仍有可補充之處，即「箕子」問題。《煇書》重訂本《官統上》云：

《易》曰：「亥子之明夷」（《易》「箕子之明夷」，趙賓作「荄茲」，云「萬物方荄茲」也。惠定宇以為「亥子」雖非其本文，而訓讀則極當。《律曆志》云「該闕於亥」，「孽萌於子」，是其義也。）算命所取法，則在於是也。彼明夷者，箕子、文王所公也。然陰陽氣無箕子。箕子言五行，出於《洛書》；文王言八卦，《河圖》也。是故言「元年」者，以「王」為文王，而擯箕子于海外營部之域，使無亂統。⁴⁷

45 朱維錚編校，《章太炎全集》第 3 冊，頁 65。

46 劉巍，〈從援今文義說古文經到鑄古文經學為史學——對章太炎早期經學思想發展軌跡的探討〉，《近代史研究》2004.3(2004.6): 74-75。

47 朱維錚編校，《章太炎全集》第 3 冊，頁 247。

雖然現代學者以明夷卦六五爻辭之「箕子」即為帝辛之諸父，⁴⁸然漢儒趙賓及法漢說之惠棟以陰陽氣理論為依據，指出「箕子」應作「菱茲」（訓讀為亥子，或「孩子」）。章氏取法後者，以《公羊傳》「元年」之「王正月」為文王，明夷卦並非「箕子、文王所公」，亦即不是同時指箕子與文王的二統並存情形。於是，「則箕子之法，必不行於域中，而文王得持其元，故曰大一統也。」⁴⁹章氏認為，一旦尊箕子會造成箕子與周文王二統並存的局面，從而導致亂統，有鑒於此，他借用以上《周易》明夷卦之異讀，提出黜箕子、尊文王的新方案，以周文王為華夏之共主。故而，在「擯箕子於海外」、棄孔子於不顧的境況下，早先依附於尊孔之下的「帝韓」之說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

綜上，從戊戌變法前後到 1904 年《煊書》重訂本問世，章太炎在政治立場上由「革政」而「革命」，在華夏正統問題上實現了由尊孔子到尊文王的變化，其間又輔之以「帝韓」充當尊孔之下的補充。⁵⁰經此一變，章氏基本上擺脫了「尊崇孔氏，以息內訌」的康、梁今文經學的束縛，轉而大加「訂孔」、「匡謬」，開始為排滿革命建立理論支撐。而「帝韓」作為章氏為維繫改良主張而達成的邏輯自洽，在其思想體系中具有短暫性和過渡性。儘管如此，它對完整理解章氏的思想歷程頗有助益。以往學界多忽視〈帝韓〉篇所體現的以朝鮮為「常主」此一環節，這是需要加以留意的。

48 梁韋，〈關於〈易·明夷〉六五爻辭的「箕子」異說〉，《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9.3: 1-4。

49 朱維錚編校，《章太炎全集》第 3 冊，頁 251。

50 童嶺，〈「海西好」，抑或「東人姝」？——從〈煊書原刻手寫底本〉論拉克伯里「西來說」之推演〉一文曾就《煊書原刻手寫底本》展開專門探討。文中注意到該手寫底本與初刻本、重訂本在紀年方式上的差異，即從「孔子紀年」到「干支紀年」（辛丑後二百三十八年）再到「共和紀年」之變化。如前所述，「辛丑後二百三十八年」乃己亥 1899 年，則「辛丑」為南明永曆政權滅亡之年 1662 年，故此干支紀年實寓有尊明之義，而章氏在 1900 年左右又主張以朝鮮繼承明朝，持「帝韓」之論，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孔子、干支、共和三種紀年方式正是尊孔、帝韓、尊文王在紀年方面的反映。童文收入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 5 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頁 158-159。

四、「排滿」之歸宿：「中華民國」與「大韓帝國」

以上種種皆證明以章太炎、鄭喬為代表的中韓部分士人在「排滿」問題上的契合。這種一致性的來源應該歸結於傳統儒學，特別是《春秋》華夷觀對兩國士人的影響。事實上，清末民初中國的所謂激進革命者，大都具有較為深厚的儒學背景。柳亞子、馬敘倫、陳去病、汪精衛等人皆受過系統的傳統文化教育，其代表人物章太炎更是古文經學大師級的人物。與此同時，明亡清興以來的尊周思明觀念直至二十世紀初，仍在朝鮮王朝有著強大的生命力，不僅賦予李恒老、崔益鉉等衛正斥邪派士大夫以強烈的「排滿」與排外意識，也深刻影響了鄭喬等革新派儒學者。

然而，由於中韓歷史脈絡的不同，兩國士人在「排滿」的旗幟下，要達到的現實功用卻不盡相同。具體來說，章太炎等中國革命黨人「排滿」的主要目的在於推翻國內的清朝政府，建立漢族人為主的政權，進而實現救亡圖存。直觀來看，「排滿」的對內性更強。不過，這並不代表革命派僅強調「安內」而不注重「攘外」。與康、梁等改良派相比，以章太炎、孫中山、黃興等為代表的革命派絕非不反對帝國主義，而是反帝的前提是「排滿」，因為他們不相信清朝能解決帝國主義問題，認為必須先推倒清朝，建立以漢族為主體的共和國家，然後才能全力對外。⁵¹ 清政府對戊戌變法的殘酷鎮壓及其在八國聯軍侵華後的媚外賣國表現，使得原先對其仍存幻想的知識分子徹底失望，認識到依靠清政府不可能實現救亡圖存的目標。章太炎在《尙書》重訂本中即言：「滿洲弗逐，欲士之愛國，民之敵愾，不可得也。」⁵² 明確指出「排滿」是一致對外的基礎。由此，革命黨人一度發表了諸多極端的反滿言論，如鄒容曾言「誅絕五百萬有奇披毛戴角之滿洲種，洗盡二百六十年殘慘虐酷之大恥辱」，⁵³ 張繼大聲呼號「吾願殺盡滿洲人，以張復仇主義，以養成復仇之壯烈國民」，⁵⁴ 這些都代表

51 張玉法，〈晚清的民族主義（1895-1911）——以章炳麟為中心的觀察〉，頁 113-127。

52 朱維錚編校，《章太炎全集》第 3 冊，頁 120。

53 鄒容，《革命軍》（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頁 7。

54 燕客，〈無政府主義序〉，收入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

了清末瀰漫於一部分革命黨人中的激進反滿情緒。就章太炎來說，他雖主張反滿和光復，但他意識到「排滿洲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⁵⁵ 聲明「排滿」只是趕走清朝政府而不排擊滿洲平民，更無種族屠殺之意，相反要以「民族主義」聯合各族，從而形成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國」。1907年，章太炎在《中華民國解》一文中正式提出了建立「中華民國」的構想，這標誌著章氏由反滿之「破」到建立新政權之「立」的重要思想轉折。「中國以先漢郡縣為界，而其民謂之華民……故以中華民國之經界言之，越南、朝鮮二郡必當恢復者也；緬甸一司則稍次也；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則任其去來也。」⁵⁶ 章氏以共同的歷史文化背景和歷史民族為根據，指出在本部十八省外，還應將「二郡一司」納入到中國的疆域範圍之內，特別是朝鮮、越南「受制異國，舉止掣曳」，中國救其於危難之中亦是自身責任所在。同時，針對西藏、蒙古、回部，章氏雖云「本非舊土」可「任其去來」，但由於三者尚未被列強蠶食侵吞，從現實利害出發，將其納入「中華民國」的領土之內相對容易，故章氏對此亦不排斥。儘管後來的歷史並未完全按照章氏的設想發展演進，但他力圖將中國本部、二郡一司乃至三荒服合而為一的努力，以及孫中山在中華民國成立時提出的「五族共和論」，和後來「漢族中心論」為主體的「國族論」⁵⁷ 等，均表明當時章太炎、孫中山等人「排滿」旨在推翻清朝政府，建立一個以漢族為主體且能最大限度保全領土、恢復舊疆的民族國家。

事實上，早在 1900 年的〈帝韓〉篇中，章氏正是把朝鮮放在中華框架之內才主張「帝韓」，而不是要尊奉一個「外國」為中華正統。其後東亞局勢波譎雲詭，朝鮮先後於 1905、1910 年淪為日本的保護國與殖民地，朝鮮的亡國事實加之朝貢體系的歷史記憶持續吸引著中國知識分子對朝鮮問題的關注。章太炎早年曾倡言「亞洲宜自為唇齒」，主張聯日抗俄，

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頁 23。

55 朱維錚編校，《章太炎全集》第 4 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頁 269。

56 同上註，頁 256-257。

57 參見楊念群，〈何謂「東亞」？——近代以來中日韓對「亞洲」想像的差異及其後果〉，《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1(2012.2): 39-53。

伴隨日本對外擴張野心的顯露，章氏逐漸改變觀念，開始大力抨擊日本吞併朝鮮之舉，並於 1914 年作《安君頌》表彰刺殺伊藤博文的朝鮮義士安重根。1924 年，章氏撰成〈大雅·韓奕義〉一文，指出《詩經》〈大雅·韓奕〉中前來朝貢周宣王的韓侯居所乃三韓之地，宣王籠絡韓侯意在讓其牽制箕子朝鮮。「箕子封地在絕遠，徒一齊不足以遙制，是故授權于韓，使犬牙相錯，其形格勢禁，亦可謂至矣。」⁵⁸ 管見所及，傳統觀點多以該篇之「韓國」在河北涿州，不過目前亦有學者提出與章氏類似的看法，認為「韓國」乃位於朝鮮半島。⁵⁹ 由此，關於「韓」之地望，學界至今仍未有明確答案，然而章太炎的這一說法，除去學術考證成分外，仍帶有原先宗藩體系的歷史記憶，以韓侯來朝宣王，實際隱含著將朝鮮納入中國版圖的期許。更典型的事例是學者蔣逸雪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所撰《殷商拓地朝鮮考》一文，其曰：「吾以殷商之拓地朝鮮，遠在相土之世，早於箕子且百歲」，提出不僅在箕子時，甚至遠在殷商先民相土之世，即已拓土東域。又說「朝鮮開拓於相土，成教於箕子，雖有土著，後盡同化，而成為殷民族之一支，禮教習俗，與中土殊無焉。今朝鮮已迫倭藩數十年，而志士仁人之謀匡復者，不顧艱危，前赴後繼，其沾匄於先民之德澤者深矣！」⁶⁰ 強調朝鮮成為中國領土在先，文化皈依緊隨其後，力圖為朝鮮歸屬中國尋求更為久遠的歷史依據，鼓舞彼時的仁人志士早日匡復舊土，蔣氏該文可謂把此種歷史記憶與現實感慨相交織的情緒表達得淋漓盡致。

58 朱維錚編校，《章太炎全集》第 5 冊，頁 34。

59 關於韓侯所居，清·陳奐，《詩毛氏傳疏》（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1992，影印家刻本），卷 25，頁 1543 疏云：「周有二韓。一為姬姓之韓……一為武穆之韓……武穆之韓封自成王之世，至西周之季尚存。其國在《禹貢》冀州之北，故得總領追貉北國，載諸《詩》篇，章章可考。」其釋「韓奕」之「韓」為近燕之韓，即武穆之韓。學者多認同此說，如陳子展，《詩經直解》（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頁 592-593、劉石，〈〈詩·大雅·韓奕〉地名考辨〉，《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1.2: 36-38、揚之水，〈說〈大雅·韓奕〉——《詩經》名物新證之三〉，《中國文化》1996.2: 40-53 等等。與上述說法不同，趙雨，〈〈詩經·大雅·韓奕〉「北國」地理考〉（《東疆學刊》2002.3: 47-60 提出《韓奕》篇中的「韓國」位於今朝鮮半島，且其為箕子朝鮮之緒餘。有關這一問題的探討，學界似乎鮮有注意到章太炎〈大雅·韓奕義〉一文。

60 蔣逸雪，《南穀類稿》（濟南：齊魯書社，1987），頁 66-74。

由此可知，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革命黨人主張「排滿」是對清朝失去信心，要在推翻清政府的基礎上建立以漢族為主體的共和國，實現救亡圖存的目標。章太炎、蔣逸雪等人更意欲恢復朝鮮等舊土，重建宗藩秩序。可是，業已跨入近代社會的朝鮮知識分子還如同往日一般向慕中華嗎？

伴隨近代以來西力東漸，清朝統治日益衰落，曾長期作為清朝藩屬國的朝鮮王朝也經歷了痛苦的蛻變歷程。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面對列強環伺、風雨飄搖中的國家，朝鮮知識分子逐漸形成了衛正斥邪派、文明開化派等思想流派。前者強調守護儒家文化傳統、排斥西洋文明，後者主張學習西洋文化，進行開化改革，折衷於兩者之間的是鄭喬所屬之東道西器派，他們主張堅持儒學綱常名教之本，同時學習西方之富強之術。儘管這些朝鮮知識分子均積極致力於尋求國家自主獨立之道，然就現實情勢而言，朝鮮王朝甫一脫離清朝之宗藩體系，又一步步淪為日本的保護國與殖民地。由此，朝鮮近代知識界以民族獨立為主題，在思想上發生了從脫清到排日的變化。而尊周思明、排滿貶清的傳統思想成為朝鮮知識分子特別是儒學者藉以脫清、排日的重要資源。

鄭喬等朝鮮儒學者借「排滿」思想脫清獨立，在甲午清日戰爭及朝鮮高宗稱帝時期有鮮明的體現。在此之前，朝鮮國內已孕育出現實的脫清基礎。十九世紀 60 年代以來，在近代化過程中日漸強大的日本與日益衰落的清朝形成了鮮明對比，在朝鮮人眼中，清朝已成為落後的象徵；另一方面，1882 年壬午軍亂後，清朝開始積極干預朝鮮內政外交，期間雙方發生不少摩擦與衝突。⁶¹ 這些因素都致使朝鮮人極其厭惡和蔑視清朝，在親華事大的既有政策下萌生出強烈的離心傾向。由此，十九世紀 80 年代初，朝鮮開化派提出「脫華獨立」「聯日排清」的政治主張，力圖將之作為基本的外交策略。⁶² 這種外交策略雖有日本兜售與鼓動的因素，但也是朝鮮

61 (韓)崔承現，〈19、20 世紀之交韓國人的中國觀〉，《韓國學論文集》(哈爾濱：黑龍江朝鮮民族出版社，2002)，頁 259-268。

62 金成鎬，〈朝鮮近代開化思想與「中華觀」的嬗變——以 19 世紀 80 年代初期開化思想為中心〉，《朝鮮·韓國歷史研究》(延邊：延邊大學出版社，2013)，頁 184-203。

在現實條件下的自主選擇。與此同時，朝鮮國內的開明知識分子援引尊周思明觀念作為脫離與清朝的藩屬關係、強調自身民族主體性的思想武器之一。如前所述，朝鮮王朝自英祖、正祖時期以來，「小中華」意識日漸膨脹，孕育出國家自主獨立的意識，成為其近代民族意識的濫觴。朝鮮知識分子強調不同於清朝的夷狄身分，朝鮮作為「小中華」繼承了明朝的正統地位，由此「小中華」意識和尊明貶清論成為朝鮮藉以形塑自身獨立國格、脫離清朝的思想資源。⁶³ 但是，與清末革命黨人「排滿」旨在推翻清朝政府不同，以鄭喬為代表的朝鮮士人無意推翻本國固有政權，他們以「忠君愛國」為號召，力圖依靠君主的政治權威，在君主立憲的框架內實現國家的獨立與富強。⁶⁴ 特別是朝鮮王朝經過甲午戰爭脫離清朝宗藩秩序、成為獨立國家後，李最榮、權達燮、趙秉世等諸多官員和士人紛紛支援高宗稱帝，以提高朝鮮的國際地位和尊嚴。當時已參加獨立協會的鄭喬不僅撰成以獨立為主旨的《大東歷史》一書，書中以安鼎福、丁若鏞等實學學者的研究為基礎，推尊檀君而非箕子為朝鮮正統之始，強調朝鮮自檀君時代以來就是自主獨立的國家，這對後來韓國近代民族主義史學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⁶⁵ 與此同時，鄭氏還曾上疏勸進，請求高宗即帝位：「在昔晉之中宗，宋之高宗皆以江左一隅之地，爰正位號，而《綱目》率以正統書之；日本則革藩國之舊制，布哇則居大洋之島嶼，《公法》皆以平等視之。其

63 王鑫磊，《同文書史——從韓國漢文文獻看近世中國》，頁 124-125。又韓東育所著《從「脫儒」到「脫亞」——日本近世以來「去中心化」之思想過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9）、《從「請封」到「自封」——日本中世以來「自中心化」之行動過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二書系統闡述了日本近世以來脫離傳統的以「中國」為中心的宗藩體系而確立自身主體性的思想與行動過程，其中著意強調了明清鼎革成為日本實現「華夷變態」、擺脫「華夷」關係邊緣地位的重要思想資源。從這一角度出發，近世以來日本、韓國逐漸擺脫中國影響、確立自我主體性的過程，實際存在某種相似性。

64 (韓)金恩珠，〈鄭喬의 政治活動과 政治改革論〉，頁 332-346。

65 參考(韓)이시영，「鄭喬의 『大東歷史』 연구」(성남시：한국정신문화연구원 한국학대학원 석사학위논문，1998)；(韓)정립비，〈한말 箕子조선 인식에 대한 재고찰——『대동역사(大東歷史)』에 나타난 기자조선 역사서술을 중심으로〉，頁 207-240。

無關於區域之廣狹，附屬之有無，推此可辨。」⁶⁶ 試圖雙向利用東亞朝貢體系與西方條約體系，借助傳統的朱熹《資治通鑑綱目》正統論和西方《萬國公法》各國平等獨立的觀念作為理論支撐，強調本民族獨立於清朝、日本等國家的合法性，為朝鮮的自主獨立尋求法理依據。其後，鄭氏特別提到「清之太祖建號於滿洲」都可稱帝建國，言下之意朝鮮又有何不可？朝鮮高宗在 1897 年建立大韓帝國，實現了從「請封」到「自封」的進程，鄭喬對此特書曰「大君主即皇帝位」，這一筆法背後暗含深刻的政治涵義。《南明綱目》鄭氏史論云：「夫正統曰即皇帝位，僭偽曰稱皇帝，史家之正例也。舊史於聖安帝之即位，遽以稱帝書之，何哉？……今茲特筆起義大書，以王即皇帝位，然後華夷之辨、統系之正，於是焉明。」⁶⁷ 可知，鄭喬在此處書「即皇帝位」而非「稱皇帝」等其他形式，其目的與《南明綱目》尊南明為正統類似，乃在昭示朝鮮的正統地位。更可注意者，高宗稱帝過程一遵明朝禮制，依據《大明集禮》確定稱帝儀式與規格。⁶⁸ 光武七年（1903），大韓帝國刊佈《大明律直解》，體現出其對明朝律法的承繼。這些舉措都暗含著朝鮮繼承明朝而為正統的深層含義。最終，清朝亦不得不承認朝鮮為平行自主之國，雙方互派使節並遞交國書。所以，朝鮮在擺脫「事大」的過程中，其理論依據融貫中西，帶有傳統與現代的雙重色彩。

不幸的是，朝鮮「聯日」脫離清朝後，並未走上獨立自主之路，反而落入日本人的殖民統治中。十九世紀末期，以金玉均（1851-1894）為代表的文明開化派呈現出鮮明的「西化」色彩與親日傾向，他們批判對清事大論，將清朝視作落後、卑賤的象徵。但文明開化派「將文明開化作為一種新的大義名分樹立起來之後，實際上建立了一種新的華夷觀，從而強調西方文化或日本經驗的普遍意義」。⁶⁹ 換言之，他們衝破了原來以中華文明為價值準繩的藩籬，卻又滑向尊奉日本、西方為新普遍標準的泥潭，未

66 朝鮮·鄭喬，《大韓季年史》，卷 2，「光武元年丁酉十月二日」條，頁 161。

67 朝鮮·鄭喬，《南明綱目》，卷 1，頁 182。

68 （韓）韓永愚著，金宰民、孟春玲譯，《朝鮮王朝儀軌》（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頁 372。

69 王元周，《小中華意識的嬗變——近代中韓關係的思想史研究》，頁 56。

能認識到日本的侵略意圖。然而，伴隨日本殖民者的步步緊逼，朝鮮知識分子逐漸看清日本人侵略鄰邦的真面目，⁷⁰ 鄭喬在所著《大韓季年史》1905年之後的記述中對日本的侵略行為進行了多次嚴厲批判。⁷¹ 由此，「排滿」意識也成為鄭氏抵禦新外侮的重要思想武器。朝鮮高宗三十二年（1895），閔妃在乙未事變中被日本浪人殺害後，以金弘集為首的親日派內閣掌握政權，隨後他們在日本人的指使下逼迫高宗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強制斷髮。鄭喬引用明末清初「畫網翁」的故事表明了自己的態度。⁷² 南明弘光元年（1645），清朝平定東南後，嚴令薙發易服，福建士人「畫網翁」堅持明朝衣冠，被清兵逮捕後每日與其家僕互畫網巾，寄託故國哀思與亡國之痛，最後被清人殺害身亡。該故事在清初流傳很廣，戴名世、李世熊、張岱等均撰有〈畫網巾先生傳〉。畫網巾先生的事蹟後來也傳播到了朝鮮。朝鮮後期著名學者成海應所撰《皇明遺民傳》中即收有〈畫網巾先生〉，將其目為明遺民而加以表彰。⁷³ 鄭喬在強制斷髮之際特別提及這一典故，乃是以「畫網翁」自擬，以清人擬日本人，聲明自己不會服從日本人斷髮易服的號令。鄭氏對網巾的眷戀不能不讓我們聯想到章太炎對「深衣殮」的執著。章氏自言其家族一兩百年來都是「遺命以深衣殮」，以示不忘漢族本源及不與新朝合作之意。⁷⁴ 然而，網巾與深衣在明代不過是束髮和下

70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日本人拋出「東洋和平」「亞洲連帶」論，強調中、日、韓等亞洲國家「同文同種」、「唇齒輔車」的緊密聯繫，主張各國聯合抵抗西方侵略。此論在當時中、韓國內著實有一定市場。例如，韓國著名義士安重根即曾撰《東洋和平論》闡述他對這一理論的構想。事實上，章太炎和鄭喬起初也接受了這一理論。章太炎於 1897 年在《時務報》撰文〈論亞洲宜自為唇齒〉，二十世紀初在日本組織亞洲和親會、東亞同盟會等均屬此類主張與實踐。即使如鄭喬在日俄戰爭時也選擇支持日本方，聲言：「我大韓之與日本為同文同種之國，壤地相接有唇齒輔車之勢」。參見前引（韓）金恩珠，〈鄭喬의 政治活動과 政治改革論〉，頁 300。這與他們後來認清日本的侵略實質後，走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立場形成鮮明對比。

71 可參考（韓）劉惠善，「『大韓季年史』를 통해 본 주인(秋人) 정교(鄭喬)의 역사의식과 현실인식」(首爾：韓國外國語大學校教育大學院碩士論文，2009)。

72 朝鮮·鄭喬，《大韓季年史》，卷 2，「高宗三十二年乙未」條，頁 134。

73 朝鮮·成海應，《研經齋全集》，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刊，《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 274 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卷 43《皇明遺民傳》（七），頁 421。

74 參見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之〈清末的歷史記憶與國家建構——以

葬的日用物件，並無太多特殊性可言，但在改朝換代、「夷亂華夏」的刺激下，它們作為「大明衣冠」、華夏冠服，儼然被賦予了深刻的文化意涵，從而由普通的日常用具化身為民族與文化認同的象徵。因此，鄭氏對網巾的堅守，不僅是在遵循明朝禮制，表達「我邦雖獨立，而明朝東援不可忘」⁷⁵的對明義理，更反映出他堅持以朝鮮為「小中華」、深恐「披髮左衽」的儒家文化底色。

事實上，與鄭氏類似，朝鮮末期衛正斥邪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淵齋宋秉璿（1836-1905）亦編有《皇朝遺民傳》一卷，以寓其抵禦外寇之意。從內容看，該書基本改編自入朝明遺民後裔王德九所撰《皇朝遺民錄》，主要記載了明末東遷朝鮮的明遺民黃功、王以文、楊福吉、馮三仕、王文祥、裴三生、王美承、柳溪山、鄭先甲諸人事跡。宋氏在本書卷末題曰：「嗚呼，日暮道遠，世且漸降。《春秋》之書，今不可復讀。余於是竊有感於匪風下泉之思。立此傳，以寓微志焉。」⁷⁶ 儘管該書撰寫具體年份不詳，但在宋氏生活的年代，朝鮮不僅日益受到外勢衝擊，更面臨著被日本吞併的民族危機。就此而言，宋氏藉明遺民傳記所「寓微志」，大致不脫離激揚忠義精神、號召民眾救亡圖存的範疇。1905年，日本脅迫朝鮮簽訂《乙巳條約》，朝鮮淪為日本事實上的殖民地，宋氏聽聞消息后服毒自殺，慷慨殉國，朝鮮王廷贈諡號曰「文忠公」。而此後不久，鄭喬亦特撰《南明綱目》大談夷夏之防，標舉尊明貶清，實際蘊含著其對國家現狀的深深擔憂。謝國楨即注意到該書承載著作者深沉的現實關懷與愛國熱情：「在日本倡狂進行侵略之時，借南明之史事，以為朝鮮之炯戒，用意實深」。⁷⁷ 此言得之。與上述「畫網翁」的典故類似，《南明綱目》乃以明清鼎革為喻，將日本比作清朝，把處於亡國危局中的朝鮮比作南明政權。鄭氏在書中辛辣抨擊清人，實則表現出他對日本侵略行徑的無限痛恨；另一方面大力表

章太炎為例〉一節（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 71-90。

75 朝鮮·鄭喬，《大韓季年史》下冊，卷 8，「隆熙元年丁未八月十六日」條，頁 294。

76 朝鮮·宋秉璿，《皇朝遺民傳》，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編，《域外所見中國古史研究資料彙編·朝鮮漢籍篇》史編史傳類第 17 冊，頁 148。

77 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上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14），頁 481。

彰南明忠臣，如「特書史可法者，嘉其以南都之領袖，痛宗國之隕亡，擁立嗣君，志存匡復也」，⁷⁸藉以鼓舞民眾士氣，力圖光復處於日本「保護」之下的大韓帝國。然而，追念明朝是否意味著鄭氏「冀望清朝有如萬曆援朝之師，再克日寇，光復家國」呢？⁷⁹實際上，即便在朝鮮即將被日本併吞的危機下，鄭喬也未必有藉助於清朝抗衡日本之意。從傳統的夷夏觀出發，清朝乃「夷狄」，不等於「中華」「中國」；從現實形勢來看，衰落腐朽、自顧不暇的清朝又是朝鮮知識分子所蔑視的對象。⁸⁰由此，鄭喬一向表現出對清朝的蔑視。事實上，鄭喬著《南明綱目》很大程度是在宣揚民族獨立自尊意識，表達自己對國權喪失的感慨及對國人的告誡，防止朝鮮徹底被外勢侵吞。那麼，對當時朝鮮人希望清朝伸以援手、共同對抗日本的揣測，或許就成為中國人的一廂情願。脫離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觀，追求獨立自主已成為二十世紀初朝鮮知識分子的基本共識，⁸¹他們念茲在茲的是獨立而強大的「大韓帝國」。⁸²這樣看來，前述意欲將朝鮮納入「中華民國」的章太炎何嘗不是與鄭喬等朝鮮人漸行漸遠呢？

78 朝鮮·鄭喬，《南明綱目》，卷1，頁177。

79 同上註，書前提要，頁151。儘管朝鮮末期朱子學代表人物柳麟錫（1842-1915）主張：「今日清固夷狄，而倭洋又夷狄之降為禽獸者也。為去禽獸之禍，則庶無不可藉力於夷狄也。」（《毅菴集》，卷24〈書呈同志諸公丁酉九月九日〉）強調聯合「夷狄」共同抗擊更大的敵人「禽獸」，即倡導聯合清朝力量排擊日本，但鄭喬作為鑒定的自主獨立派人士，堅決排斥事大，其與柳氏的觀點並不相同。關於這一時期朝鮮儒林的相關活動，可參考（韓）鄭旭宰，「한말·일제하 유림 연구：일제협력유림을 중심으로」（城南：韓國學中央研究院教育學博士論文，2009）。

80 （韓）白永瑞，《思想東亞》（北京：三聯書店，2011），頁205-243。書中指出，根據大韓帝國時期發行的三種重要報紙，可以發現當時韓國人的中國認識主要有三種，一是以獨立協會所辦《獨立新聞》為代表的「賤之清」，二是「作為東洋和平一員的中國」，三是「作為改革典範的中國」。從前文分析可看出，鄭喬作為獨立協會的重要成員，其對清觀確乎以「賤之清」為主。

81 當然，也存在一些仍然堅持傳統「春秋大一統」觀念的保守派士人，如柳麟錫和李承熙仍將朝鮮復國的希望寄託在中國的復興上，但與日益強大的民族主義者相比，他們畢竟不再是歷史的主流。參見王元周，《小中華意識的嬗變——近代中韓關係的思想史研究》，頁126-127。

82 （韓）李潤和，《中韓近代史學比較研究》，頁88-92。

五、結 語

二十世紀初，在救亡圖存的時代背景下，中韓兩國出現了相似的「排滿」思想，上文主要以章太炎和鄭喬為線索對這一現象進行了初步的勾勒與梳理，指出章、鄭等中韓知識分子不約而同地訴諸明清鼎革時期的「排滿」思想與歷史記憶作為思想資源。章、鄭在「排滿」思想上的契合在章氏《嘯書》初刻本〈帝韓〉篇中達到頂峰。不過，由於兩國的具體國情存在巨大差異，他們雖同樣標舉「排滿」，內裡的動機與目的卻不盡相同。事實上，包括鄭喬在內的韓國近代知識分子孜孜以求的目標是大韓帝國的獨立自主，鄭氏引「畫網翁」之典、撰《南明綱目》，乃是以「排滿」來排清、排日，旨在追求民族獨立，維持大韓帝國的自主命脈；而以章太炎為代表的清末民初革命黨人旨在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統治，建立以漢族為主的甚至涵攝朝鮮在內的「中華民國」。雙方基於各自不同的國情與現實境況，做出了不同的選擇。可以說，這既是中、韓兩國「漸次分途」的印證，也是近世以來東亞文化共同體走向衰亡的迴響，為我們深入理解當代東亞國際關係提供了有益的歷史借鑑。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清·俞樾，《春在堂隨筆》，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
- 清·陳奂，《詩毛氏傳疏》，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1992，影印家刻本。
- 清·劉聲木，《萇楚齋隨筆、續筆、三筆、四筆、五筆》，北京：中華書局，1998。
- 朱維錚編校，《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1985。
- 朝鮮·成海應，《研經齋全集》，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刊，《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 274 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
- 朝鮮·柳麟錫，《毅菴集》，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刊，《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 338 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
- 朝鮮·趙徹永，《續明史》，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編，《域外所見中國古史研究資料彙編·朝鮮漢籍篇》史編史傳類第 14 冊，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3。

朝鮮·鄭喬，《大韓季年史》，首爾：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57。

朝鮮·鄭喬，《南明綱目》，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編，《域外所見中國古史研究資料彙編·朝鮮漢籍篇》史編史傳類第17冊，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3。

二、近人論著

(韓) 김우철 2010 〈鄭喬의 중국사이해와 현실인식〉，《史叢》70(2010.3): 29-58。

(韓) 배향섭 2014 〈鄭喬의 관직경력과 사회활동〉，《韓國史研究》165(2014.6): 185-224。

(韓) 이시영 1998 「鄭喬의 『大東歷史』 연구」，성남시：한국정신문화연구원 한국학대학원 석사학위논문。

(韓) 정립비 2018 〈한말箕子조선 인식에 대한 재고찰——『대동력사(大東歷史)』에 나타난 기자조선 역사서술을 중심으로〉，《사림》65(2018.7): 207-240。

尤學工、余康 2016 〈論章太炎的明史研究〉，《史學史研究》2016.4(2016.12): 53-65。

王元周 2007 〈認識他者與反觀自我——近代中國人的韓國認識〉，《近代史研究》2007.2: 61-79。

王元周 2013 《小中華意識的嬗變——近代中韓關係的思想史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王汎森 2001 《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王汎森 2013 《權力的毛細管作用》，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王汎森 2014 《章太炎的思想——兼論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春霞 2005 《「排滿」與民族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王鑫磊 2016 《同文書史——從韓國漢文文獻看近世中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民意 1906 《民報》10(1906.12)，頁82。

(日) 石川禎浩 2005 〈20世紀初年中國留日學生「黃帝」之再造——排滿、肖像、西方起源論〉，《清史研究》2005.4(2005.12): 51-62。

民意 1906 〈紀十二月二日本報紀元節慶祝大會事及演說辭〉，《民報》10(1906.12)，頁82。

(韓) 申滢植編 1999 《韓國史學史》，首爾：三英社。

- (韓) 白永瑞 2011 《思想東亞》，北京：三聯書店。
- 朱希祖 2012 《明季史料題跋（外二種）》，北京：中華書局。
- 朱海濱 2012 〈錢塘江潮災與張老相公信仰〉，《海寧史志》2012.3(2012.9): 19-33。
- 朱務本 1989 〈亞洲和親會的作用、局限及其他〉，《華中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1989.3: 55-60。
- (韓) 朴仁鎬著，全瑩、金錦子、鄭京日譯 2012 《韓國史學史》，香港：香港亞洲出版社。
- 何冠彪 1996 〈清高宗對南明歷史地位的處理〉，《新史學》7.1(1996.3): 1-27。
- 何冠彪 1999 〈清高宗《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的編纂與重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0.3(1999.9): 671-697。
- 李帆 2008 〈西方近代民族觀念和「華夷之辨」的交匯——再論劉師培對拉克伯里「中國人種、文明西來說」的接受與闡發〉，《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2(2008.4): 66-72
- 李光濤 1950 〈記朝鮮《宣廟中興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2(1950.7): 297-302。
- 李光濤 1955 〈明季朝鮮「倭禍」與「中原奸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6(1955.6): 315-334。
- 李潤蒼 1981 〈試論章太炎的民族主義〉，《近代史研究》1981.3(1981.8): 256-285
- (韓) 李潤和 1994 《中韓近代史學比較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易勁鴻 2002 「張繼與辛亥革命」，湖南：湖南師範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金成鎬 2013 〈朝鮮近代開化思想與「中華觀」的嬗變——以 19 世紀 80 年代初期開化思想為中心〉，《朝鮮·韓國歷史研究》，延邊：延邊大學出版社。
- (韓) 金恩珠 1998 〈鄭喬의 政治活動과 政治改革論〉，《韓國思想史學》11(1998): 291-349。
- 孫衛國 2007 《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北京：商務印書館。
- 秦麗 2015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考論〉，《史學史研究》2015.4(2015.12): 109-118。
- 秦燕春 2008 《清末民初的晚明想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馬勇編 2003 《章太炎書信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
- 張繼 1985 《張溥泉先生回憶錄·日記》，《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 3 輯第 24 冊，臺北：文海出版社。

- 張玉法 2007 〈晚清的民族主義（1895-1911）——以章炳麟為中心的觀察〉，《第二屆中國近代思想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1-21。
- 梁章 2009 〈關於〈易·明夷〉六五爻辭的「箕子」異說〉，《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9.3: 1-4。
- 章開沅 1996 〈辛亥革命時期的社會動員——以「排滿」宣傳為實例〉，《社會科學研究》1996.5: 93-99。
- 章開沅 1981 〈「排滿」與民族運動〉，《近代史研究》1981.3(1981.8): 72-93。
- 陳子展 2015 《詩經直解》，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陳永明 2011 《清代前期的政治認同與歷史書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陳永明 2016 〈政治抑壓下的集體記憶——清初張煌言事蹟的傳播〉，《漢學研究》34.2(2016.6): 107-140。
- (韓) 崔承現 2002 〈19、20 世紀之交韓國人的中國觀〉，《韓國學論文集》，哈爾濱：黑龍江朝鮮民族出版社。
- (韓) 許太榕 2007 〈17세기 말~18세기 초 中華繼承意識의 형성과 正統論의 강화〉，《진단학보》103(2007.6): 59-85。
- (韓) 許太榕 2007 〈英·正朝代 中華繼承意識의 강화와 宋·明 역사서의 편찬〉，《朝鮮時代史學報》42(2007.9): 237-269。
- 揚之水 1996 〈說〈大雅·韓奕〉——《詩經》名物新證之三〉，《中國文化》1996.2: 40-53。
- 楊定名 1982 〈論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革命排滿」口號〉，《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2.2: 70-76。
- 湯志鈞 1982 〈章太炎在臺灣〉，《社會科學戰線》1982.4(1982.12): 142-151。
- 湯志鈞 2013 《章太炎年譜長編（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
- 童嶺 2013 〈「海西好」，抑或「東人姝」？——從〈煇書原刻手寫底本〉論拉克伯里「西來說」之推演〉，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 5 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楊天石 2007 〈中韓愛國志士的早期聯繫〉，《史學月刊》2007.3: 51-58。
- 楊念群 2008 〈章學誠的「經世觀」與清初大一統意識形態的建構〉，《社會學研究》2008.5(2008.10): 1-41。
- 楊念群 2012 〈何謂「東亞」？——近代以來中日韓對「亞洲」想像的差異及其後果〉，《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1(2012.2): 39-53。
- 楊啓樵 1994 〈論全謝山史學的精髓〉，《清史研究》1994.2(1994.6): 105-108。

- 葛兆光 2014 《想像異域——讀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札記》，北京：中華書局。
- 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 1983 《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鄒容 2002 《革命軍》，北京：華夏出版社。
- (美)路康樂(Edward J. M. Rhoads) 2010 《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1861-1928)》，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趙雨 2002 〈〈詩經·大雅·韓奕〉「北國」地理考〉《東疆學刊》2002.3: 47-60。
- (韓)趙萬濟、孫科志 2000 〈趙素昂先生略傳〉，浙江大學韓國研究所編，《韓國研究》第4輯，杭州：浙江大學韓國研究所。
- 劉大年 1987 《劉大年史學論文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 劉石 1991 〈〈詩·大雅·韓奕〉地名考辨〉，《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1.2: 36-38。
- 劉巍 2004 〈從援今文義說古文經到鑄古文經學為史學——對章太炎早期經學思想發展軌跡的探討〉，《近代史研究》2004.3(2004.6): 61-100。
- 劉浦江 2014 〈元明革命的民族主義想象〉，《中國史研究》2014.3(2014.9): 79-100。
- 劉浦江 2014 〈太平天國史觀的歷史語境解構——兼論國民黨與洪楊、曾胡之間的複雜糾葛〉，《近代史研究》2014.2(2014.4): 84-99。
- 劉浦江 2017 《正統與華夷——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 (韓)劉惠善 2009 「『大韓季年史』를 통해 본 추인(秋人)정교(鄭喬)의 역사의식과 현실인식」，首爾：韓國外國語大學校教育大學院碩士論文。
- (韓)鄭旭宰 2009 「한말·일제하 유림 연구: 일제협력유림을 중심으로」，城南：韓國學中央研究院教育學博士論文。
- 蔣逸雪 1987 《南穀類稿》，濟南：齊魯書社。
- 錢玄同 1936 〈太炎先生輓聯〉，《制言》22(1936.8)，頁4。
- 謝國楨 2014 《增訂晚明史籍考》上冊，北京：北京出版社。
- 韓東育 2009 《從「脫儒」到「脫亞」——日本近世以來「去中心化」之思想過程》，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韓東育 2016 《從「請封」到「自封」——日本中世以來「自中心化」之行動過程》，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韓)韓永愚著，金宰民、孟春玲譯 2012 《朝鮮王朝儀軌》，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 瞿駿 2015 〈歧義與多義——清末「排滿」立論與接受的再考察〉，《史林》2015.6(2015.12): 122-134。

“Expelling the Manchus” and Chinese and Korean Intellectual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Thoughts of Zhang Taiyan and Zheng Qiao

Qin Li*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operating with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 salvation, the memory and the concept of “expelling the Manchus” 排滿, which had formed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Ming dynasty, became an ideological resource for Zhang Taiyan 章太炎 (1868-1936), Zheng Qiao 鄭喬 (1856-1925), and other Chinese and Korean intellectuals. Zhang and Zheng not only interacted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written works on the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but both also included the notion of “expelling the Manchus” within their thinking, which is clearly reflected in the chapter “Di Han” 帝韓 found in *Qiushu* 卮書. The chapter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Korea and dismisses the legitimacy of Qing dynasty as well as being the final addition that Zhang made towards his reformist stance during his early years; however, after Zhang’s shift towards revolutionary thought, the chapter “Di Han” was deleted. Due to differences in specific national conditions, although both countries employed the concept of “expelling the Manchus,” internal motivations and purposes completely differed. For example, Zheng Qiao and other Korean intellectuals of the modern era utilized the notion of “expelling the Manchus” to exclude both the Qing dynasty and Japan, seeking national independence. In contrast, revolutionary though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represented by Zhang Taiyan, aimed to launch a revolution of “expelling the Manchus” to overthrow Qing dynastic rule, and thus, establish the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was to be dominated by the Han nationality, even including Korea. In this way, both parties had made their own

* Qin Li,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Faculty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choices based on different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which in turn, also marked the different development paths for China and Korea moving forward.

Keywords: the thought of “expelling the Manchus” 排滿 in China and Korea,
Zhang Taiyan 章太炎, Zheng Qiao 鄭喬